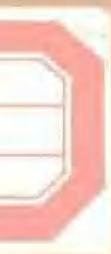


非洲 共产主义

戴维·奥塔韦 玛丽娜·奥塔韦著



东方出版社

非洲共产主义

[美]戴维·奥塔韦 玛丽娜·奥塔韦著

魏培忠 艾平 肖援朝 王平译

東方出版社

030042

David and Marina Ottaway
AFROCOMMUNISM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根据美国非洲出版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非洲共产主义

FEIZHOU GONGCHANZHUYI

作者/[美]戴维·奥塔韦 玛丽娜·奥塔韦

译者/魏培忠、艾平、肖援朝、王平

封面设计/王师颀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737×1092 毫米 32 印张/10.25 字数/211,000

版次/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750

 东方出版社出版 书号 3153·2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定价 1.7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学者奥塔韦夫妇研究非洲问题的专著。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已研究非洲问题达十八年之久，其间有八年时间是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度过的，因此得以对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作者提出了“非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把非洲自称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称为“非洲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有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书中分述了这三个国家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外来影响（苏联、古巴等）问题，也综述了非洲的全面情况及发展趋势。

本书在国外政治理论学术界获得好评，现予翻译出版，供我国国际共运及国际问题教学研究人员参考。

目 录

第一章	激进主义新浪潮·····	1
第二章	从非洲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21
第三章	非洲社会主义重探·····	58
第四章	莫桑比克·····	107
第五章	安哥拉·····	152
第六章	埃塞俄比亚·····	195
第七章	民族主义与世界革命·····	240
第八章	非洲共产主义论辩·····	291

第 一 章

激 进 主 义 新 浪 潮

大约十六年前，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在首次出访非洲大陆的时候曾说过，看来非洲革命的前景“很好”。这话曾使西方感到震惊。但是，六十年代的事态发展证明，他的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站不住脚，或者至少是不成熟的。因为，那些第一代激进的非洲领导人一个接一个被赶下了台。西方从中国人和苏联人一连串的挫败中感到安慰，胜利地克服了第一次巨大的“红色恐惧症”。此后，美国想出了一种政策，轻易地把非洲的命运交给了前殖民大国，差不多十来年，黑非洲简直被丢到了脑后。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西方的政策制订者、学者和政治家们又开始关注非洲的命运，并且在寻思：非洲革命的条件是否真的已经最后成熟，“就要变成共产主义的了”。因为，尽管非洲共产主义困难重重，挫折频仍，而且有种种不利的预测，但是，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在非洲大陆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且看来非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在苏联、东德和古巴的大规模援助下，正在迅速得势。西方再次陷入惊恐之中，美国也变得紧张起来，力图阻止这一新的红色浪潮。

在六十年代，当时在熟悉非洲大陆的中国人、苏联人和美

国人中间对非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有一个可能是最普通的口头禅，“没有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黑非洲似乎已成为世界上一些最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许是最后一批真正的信徒的滋生地了。因此，此中的讽刺意味就更大了。越来越多的非洲领导人正试图证明，马克思和列宁所主张的社会发展有其普遍规律，既适合于欧洲和亚洲，也适合于非洲，这种看法是绝对正确的。有时，他们的追求近于荒谬，好象是根据一种理论在黑暗中寻找某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在非洲大陆并不存在。因为，非洲最重要的特点是绝对的贫困、工人阶级还处于婴儿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极端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与它在现实中作为争取经济迅速增长或争取政治稳定发展的模式所取得的具体成功事例相比，似乎极不相称。但是，对这一学说的信仰不仅仍然坚持不舍，而且还有不断增强之势，非洲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掌权的机会也已经大大增加。

1980年，非洲五十个独立的黑人和阿拉伯国家中，有七个是在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统治下的国家。它们是安哥拉、贝宁、刚果、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索马里。至少另外还有九个国家信奉某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它们是阿尔及利亚、佛得角群岛、利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群岛、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十六个国家的人口占非洲四亿二千五百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不少国家，象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比绍十分贫穷。这就使得那些对非洲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认定，这种理论只不过是给这些国家提供一种均分贫困的理由，而不

是均分什么财富。但是，有几个国家拥有很重要的自然资源，使它们成为非洲大陆当今或未来最富有的国家。这类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安哥拉、赞比亚和几内亚。不管这些国家是穷还是富，很多国家所处的位置，不论从东、西方地缘政治斗争的角度，或是从潜在的非洲内部冲突的角度来看，都有战略重要性。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是所谓非洲之角国家，它们濒临红海和曼德海峡这些重要的国际水道。莫桑比克临印度洋绵亘一千七百英里，正处在南非的北方，而南非又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最后争夺的目标和战场。安哥拉掌握着决定邻国扎伊尔未来命运的一把钥匙，而扎伊尔是依附西方的拥有大量矿藏而政治上又非常动荡的重要国家。阿尔及利亚凭其地大物博，控制着马格里布的东北部。它与另一个素来亲西方的摩洛哥为邻。摩洛哥因吞并西属撒哈拉触发战争而于七十年代末深陷困境。马达加斯加，这个东非海岸附近最大的岛国，濒临莫桑比克海峡，开往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油船定期地经过这里。最后是刚果，它的狭长的国土从大西洋一直伸向非洲心脏，在安哥拉内战时期曾充当苏联和古巴人进行军事活动的集结待运地而显出它的作用。看来，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国家，或因其资源丰富，或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在决定整个非洲大陆的命运方面，它们各自或者一起都注定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其他黑非洲国家传播的可能性看来也很大。纳米比亚战斗的民族主义团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新独立的津巴布韦的领导人罗伯特·穆加贝并不掩饰他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决心。虽然南非同西方关于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实行选举的谈判被南非拖延下来,但是,看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执掌政权只是个时间问题。在津巴布韦,穆加贝小心谨慎,生怕引起白人发动或支持的反对他的政变,在掌权初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出人意外的稳健。但是,他依然宣称,他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想在向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社会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在整个南部非洲出现一批战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性看来是很现实的。在印度洋的岛国毛里求斯,到七十年代末,最大的一个政党就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毛里求斯战斗运动。这一组织不断壮大,它在当地城市政治生活中的优势日益增长,这使它很有可能 在 1981 年下届大选中获胜。^①在中非,扎伊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很糟糕,继续使这个国家经常遭到反对蒙博托总统的激进派的攻击。在马格里布,波利萨里奥运动的游击队,背后有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又受到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鼓舞,看来越来越有机会在争取西撒独立的斗争中取胜。这对哈桑国王及其亲西方的谢里夫君主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非洲的事态发展常常难以预料。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加上政治形势长期不稳,看来这就为更加激进的非洲领导人上台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非洲四十五个非产油国的年经济增长率,1978 年几乎等于零,1979 年差不多也是如此。八十年代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善的希望。甚至,照联合国机构和美国政府的看法,大部分非洲国家总的经

^① 大选于 1982 年 6 月举行,毛里求斯战斗运动与社会党结盟,获胜上台执政。1983 年,毛里求斯战斗运动发生分裂。——译注

济发展前景简直令人恐慌。

在美国，多年来通常把非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看作是外部共产党大国利用当地的冲突和内部政治动乱扶植“它们的代理人”上台的结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1979年末在国会作证时说，“在我们谈论非洲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几乎只是讲苏联、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古巴，甚至还有中国的作用”。象是屡屡出现的恶梦，这个或那个共产党国家不断地卷土重来，插手一些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至少，这是美国历届政府精心制造的非洲共产主义的形象。其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一样，只是当他们突然觉察到西方盟国或西方在非洲大陆的利益受到共产党国家的威胁，或是深刻感到共产党国家要打破东、西方在那里的力量均势的时候，黑非洲才真正引起他们政治上的严重关注。六十年代在刚果问题上，七十年代在安哥拉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发出的惊呼，就是这种态度的主要例证。尽管美国对于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发展有过这种紧张的、只是一时的关注重视，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制订出一种“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发展的长期政策和战略。美国甚至也没有设法了解一下在非洲内部是否有某些力量有利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至少是那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对付它们。美国在对付那些招来共产主义幽灵的连续出现的危机中，采取临时应付的办法已成为美国对黑非洲的外交政策的特征。卡特总统一上台就想克服这种临时应付的局面，并根据对非洲的新的长远看法制订了政策。卡特开始曾声称，美国已经克服了它“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恐惧”，并且接受了安德鲁·扬的估计，认为在南部

非洲对西方的主要威胁是种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但是，还不到两年，他对于非洲共产主义的态度，就又返回到了美国传统的立场，指责古巴人对非洲内部事务进行“无理的干涉”，并把他刚开始促进同卡斯特罗和解的努力停了下来。显然，美国还远没有克服它“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恐惧”。

对于非洲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学者和国会迄今已经历过两个近乎狂乱的时期，中间隔着一个时期，整整十年沾沾自喜地认为害怕是毫无意义的。在六十年代初期，他们曾一度陷入真正的极度狂乱状态，那是因为当时出现了被看作突如其来的共产主义的大攻势，要把一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从它们前殖民地宗主国那里争取过去。象沃尔特·拉克这样一位不同一般的作者，1961年他为美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显要人物的杂志《外交》季刊撰写了一篇文章，用了这样的评论开头：“几乎一夜之间，非洲共产主义便成了头等重大的国际问题”。他说，获得解放的非洲大陆已经成了“世界的主要的麻烦中心”。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或者亲苏和亲华的国家，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整个黑非洲和阿拉伯非洲建立起来。先是加纳，它在富于幻想的泛非主义者克瓦米·恩克鲁玛的领导之下。恩克鲁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他的国家1957年独立后，一年一年地变得越来越明显。然后，是塞古·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1958年几内亚与法国突然决裂并转向苏联求援。这比卡斯特罗上台还要早三个月。在马里，莫迪博·凯塔领导他的国家于1960年获得独立。两年之内，他大力推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表示赞赏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1962年阿尔及利亚在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

民族解放战争之后，终于取得了独立。一个战斗的社会主义反西方的斗士，艾哈迈德·本·贝拉领导了这个国家。不久，他便跑到纽约联合国，又从联合国直接跑到哈瓦那，表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卡斯特罗，从而把阿尔及利亚带进了东西方冷战之中。非洲战斗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他们激进的同情心公诸于全世界，他们还联合起来支援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卢蒙巴以后的左翼分子在战祸频仍的比属刚果（后改名为扎伊尔）掌权。苏联利用它在非洲新发现的盟友，运武器给左翼叛乱分子反对西方支持的利奥波德维尔的领袖们。这就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制造了严重对立的冷战气氛。

但是，到六十年代中期，这种“红色威胁”看来开始消退。苏联人和中国人在一些国家做得太过火了，另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非洲激进领导人的俱乐部在开始萎缩。1961年共产党人第一次遭到厄运，苏联驻几内亚大使因为支持反对杜尔总统的颠覆活动而被驱逐出境。1965年初中国驻布隆迪大使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中国大使被指责干涉布隆迪与其邻国前比属刚果的内政。当时，刚果的内战和分裂活动还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主要心病。华盛顿要求联合国“拯救”刚果，使其免于混乱、崩溃和很可能沦为卢蒙巴分子领导下的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权。真没想到，美国这一着奏效了。卢蒙巴神秘而轻易地被杀害了，一个亲西方的陆军军官蒙博托最后上了台。依仗比利时和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联合国的支持，蒙博托最后战胜了卢蒙巴分子的叛乱和加丹加分裂分子的首领莫瓦泽·冲伯。

当西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刚果事态发展的时候，在其他

地方，共产党国家的许多盟友也开始不见了。1965年6月本·贝拉，非洲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第一个被军方推翻。领导政变的是胡阿里·布迈丁上校。他先是激烈地谴责“外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这种意识形态是由本·贝拉在欧洲托洛茨基分子的帮助下引进穆斯林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没过几个月，1966年2月恩克鲁玛也被他自己的军队一举赶下了台，他的人民连一点儿反对的表示都没有。后来，1968年11月，这次轮到了凯塔，也是被军人赶下台的。看来，事态发展的确对西方有利。这种趋势一直继续到七十年代初期。1971年7月，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险些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干掉。此后，他的政权就改变了方向，断然不再与苏丹共产党人和苏联合作了。又只过一年，安瓦尔·萨达特勒令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立即离开埃及，并断绝了埃及同莫斯科的军事联系。此举使东、西方都感到震惊。其实，萨达特早就不声不响地动手破除已故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和亲苏政策。共产党大国1965—1974年间在非洲遭到了这一系列挫折，仅有的例外是法属刚果和索马里，而后者最为重要。1969年刚果成了第一个自称为“人民共和国”，并正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非洲国家。同年，由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领导的一个激进的军人集团在索马里夺取了政权，此后，便使索马里不断地摆脱西方而向苏联靠拢，终于在1974年7月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莫斯科同撒哈拉以南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合作条约。

西方学者和政策制订者们看到许多激进的非洲国家政权

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遭到失败，苏联人和中国人在他们初步开展的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中也不断遭到挫折，因而得出结论，在非洲大陆要提倡社会主义，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更不用说进行革命了。著名的法国农学家勒内·杜蒙，在他的1969年世界社会主义政权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在非洲推行社会主义的整个做法需要作“必要的修正”。他指出，从当前非洲各国的情况看，在非洲搞“严格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美国，许多学者也持同样的怀疑态度。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被贬斥为伪装的“民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认为它只不过是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进程进行辩护的“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有趣的是，苏联人对非洲社会主义的判断也同样持怀疑态度。莫斯科的非洲问题专家，在如何看待象牙内亚、马里、加纳和阿尔及利亚这类国家的问题上，经过曲折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之后，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术语来表述非洲人想实行社会主义的企图，并且小心翼翼地称之为“民族民主主义”。苏联领导人在给这些国家领导人颁发列宁和平奖章或授予其他荣誉时，也谨慎地避免把他们称作“社会主义者”。苏联领导人也和杜蒙一样，得出结论，认为眼下在非洲实行科学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非洲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不那么气馁。他们没有放弃希望和信念，而只是抛开温和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分析本大陆的问题和研究严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必要性时，他们变得更加遵从正统了。那时，正当激进分子似乎极为倒霉的时候，他们的吉星高照了。

1974年4月，一个激进的军人集团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夺取了政权，为葡萄牙摇摇欲坠的非洲帝国敲响了丧钟。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影响所及，在一年半之内先后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在几内亚比绍建立了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政权；1974年6月，埃塞俄比亚一批下级军官发动了后来称之为“爬行政变”的反对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政变，到9月废黜了塞拉西皇帝。不到三年，埃塞俄比亚的领导人变成了可能是非洲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达荷美（今贝宁），1972年上台的马蒂厄·克雷库中校1974年11月发动了一场“革命内部的革命”，宣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最后，1975年6月，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海军司令迪迪埃·拉齐拉卡被他的军中同僚推为新掌权的最高革命委员会的领袖，马达加斯加对内对外政策随即激烈地向左转，成为又一个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抱的非洲国家。

当美国人怀着某种兴趣和对埃塞俄比亚的前途担忧的心情注视着埃塞俄比亚的事态发展的时候，1975年初在安哥拉爆发了内战和权力之争。正是这场内战和权力之争才把美国从十年对非洲几乎全然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唤醒过来。1975年10月和11月大批古巴战斗部队开抵安哥拉，救援陷入困境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抵抗由南非指挥，由安人运的对手发动的进攻。这一事件激起了福特政府，更确切地说，激起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出自内心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应。基辛格实际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事务一无所知，他以前在制订美国对外政策时，心目中也并没有非洲。他之所以对安哥拉突然感兴趣，完全是因为他一心一意强烈地认为，越南战争之后，

苏联及其盟国古巴正乘美国意志软弱之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正如拉克早在十四年前就写过的那样，几乎一夜之间，非洲共产主义又一次成了头等重大的国际问题。

1974 到 1975 年这一时期是苏、美为了非洲重开冷战的转折时期，同时也是非洲内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那些终于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作为他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分别在安哥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埃塞俄比亚掌了权。同时，贝宁先是在一些事件中向左转，最后也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没有丝毫证据说明，上述这些情况的发生是出自莫斯科、哈瓦那或北京制订的关于黑非洲的“共产主义宏伟战略”。其实，有种种迹象表明，对于这一形势，特别是苏联人也和西方任何人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甚至由于安人运内部破坏性的派系斗争而懊丧至极，于 1973 年末完全断绝了对这一组织的援助。苏联、古巴和东德，他们都没有在安哥拉内战爆发之后，通过 1975 年中期开始到达非洲大陆的大批顾问、技术援助人员和战斗部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出”到非洲去。在每个国家，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多年来的政治变化，时机逐渐成熟，激进分子得以掌权。比如，许多民族主义游击队在非洲殖民地同葡萄牙人已经打了十多年仗。他们缓慢地、但坚定地向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些国家的首都前进。多年的斗争使他们在很多方面变得很激进，他们的民族主义终于加上了更加明确的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战斗期间，他们在解放区多年的组织工作经验使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相信，解决问题还是要靠集体的而不

是个人主义的观点。另外，西方表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的声明不冷不热，抵销不了这样的事实，西方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葡萄牙，而东方却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外交支持。虽然没有哪一个前葡属殖民地在取得独立之后马上就在首都上空升起了红旗，但是，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行动的信号并不是来自苏联和古巴，而是来自民族主义领导人，在独立斗争之后他们注意观察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可能的外国盟友。

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这也不能由苏联人或古巴人负责。在这两个国家掌权的甚至不是当地的共产党人，而是那些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激进的军官们。他们之所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处于内部经济政治困境。埃塞俄比亚也许是黑非洲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的分析第一次很自然地同这个国家的客观情况相符合。早在苏联人和古巴人插手之前，埃塞俄比亚的军官和一伙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文职顾问人员就已经计划、宣布、并实行了许多最激进的措施。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对那里的革命，苏联人和古巴人丝毫没有责任。马达加斯加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激进的改革是岛内军界上层人员之间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正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远在这以后的事。此外，即使马达加斯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也并不表示它同苏联和古巴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关系。贝宁和刚果也有同样曲折的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最后是最激进的军界人士掌了权。到1980年为止，从各种情况看来，无论如何不能说，莫斯科或哈瓦那曾在哪一个黑非洲或阿拉